

四川大學中文系《新國學》編輯委員會

新
國
學

第三卷

己酉書記

四川大學中文系《新國學》編輯委員會

新 國 學

第三卷

巴蜀書社·中國·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新國學/項楚等著. —成都: 巴蜀書社, 2001.12

ISBN 7-80659-318-7

I . 新 ... II . 項 ... III . 社會科學 - 中國 - 叢刊

IV . C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2) 第 008646 號

責任編輯: 王大厚

封面設計: 李文金

責任校對: 李 嘉

新 國 學 (三)

四川大學中文系《新國學》編輯委員會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 3 號 郵政編碼 610012

總編室電話: (028) 6656816

發行一科電話: (028) 6660483

發行二科電話: (028) 6658275

發行三科電話: (028) 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西南冶金地質印刷廠

成都市二仙橋東三段 5 號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13.625 字數: 338 千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200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 冊

ISBN 7-80659-318-7/I·127 定價: 3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聯繫調換

稿 約

一、《新國學》是刊布當代學者用現代科學精神研究中國古典文獻的最新成果的專業學術刊物。由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主辦。

二、本刊熱忱歡迎海內外同行專家學者惠賜尊稿。本刊登載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論文，內容包括以中國古典文獻為載體的以下學科：文學、史學、哲學、宗教學、倫理學、美學、藝術學、考古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敦煌吐魯番學、政治學、軍事學、經濟學、博物學、科技史、民俗學、闡釋學以及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比較研究。

三、本刊刊發中文稿件，要求用繁體字書寫，尾注。若以電腦打印，請在打印稿之外，附以純文本文件方式儲存的軟盤，或者將文件發至電子信箱。國標 7000 字以外的字或符號，要求手寫在打印稿上。來稿請另頁按順序寫上論文題目、作者姓名、工作單位、通訊地址、郵政編碼。

四、本刊採用匿名審稿制。來稿均由編委會送呈校內外至少兩位同行專家審閱，再由編委會決定是否採用。

五、編委會對來稿可提出修改意見，但除了技術性的處理外，不代為作者修改。文責自負。

六、請勿一稿兩投。來稿敬請自留底稿，本刊將在三個月之內答復，若未得答復，作者可另行處理。

七、來稿刊出後，贈送樣書二冊，大陸作者並酌付稿酬。

八、來稿請寄：中國四川省成都市九眼橋四川大學中文系項楚教授收，郵編：610064。

電子信箱：xgx69@yahoo.com.cn

《新國學》希望得到各界的關心和支持！

卷之三

目錄

| | | |
|-----------------------------------|---------|-------|
| （二）據清末《中華書局編印之古文辭學講義》卷之三 序文、附錄 | 目 | 錄 |
| （175） 越南訪書札記 | 王小盾 | （1） |
| （176） 王國維“大毛公作《故訓》小毛公作《傳》”說辨 | [香港]宗靜航 | （54） |
| 《焦氏易林》與《詩經》淺談 | 杜志國 | （82） |
| 司馬遷對易理的承傳之管窺 | 韓偉表 | （101） |
| 司馬遷漢賦研究發微 | 踪 凡 | （116） |
| 魏晉名士談玄辨理 | 周裕鎧 | （132） |
| 曹子建詩卓犖舉隅 | [臺灣]朱曉海 | （165） |
| 稽康山濤絕交考 | 祁 偉 | （204） |
| 《文鏡秘府論》對屬論札記 | 盧盛江 | （214） |
| 論乾淳“太學體” | 祝尚書 | （230） |
| 陳三立詩學思想蠡測 | 閔定慶 | （247） |
| 唐代前期史化小說與唐代小說的興起 | 韓雲波 | （275） |
| 《夷堅志》“莆田處子”故事研究 | 劉黎明 | （299） |
| 略析敦煌文獻中所見的念佛法門 | 張子開 | （314） |

- 龐居士之遺跡與傳說考 譚 偉 (335)
——兼談古跡傳說與民間文化

- 蘇詞《漁家傲》一首繫年略考 張志烈 (347)
乾隆朝禁毀戲曲曲目考 趙維國 (354)

- 呂南公里籍考 [臺灣]何廣樅 (371)
——讀《直齋書錄解題》札記
歷史與文化的互動 劉曉春 (374)
——一個贛南客家家族制度的個案研究
編後記 (430)

(431) 古廟宇 1
——秦晉王廟 1
——崇寧宮 1
——崇寧宮 1

(431) 韻體原 1
——唐詩 1
——宋詞 1
——元曲 1

(432) 俗文化 1
——漢代 1
——唐宋 1
——元明 1

(433) 如琴館 1
——五胡亂華 1
——小分封 1
——小北 1
——謀略 1
——即興 1
——宣傳 1
——下獄 1

(434) 楊柳青 1
——門戶階級 1
——風情中風流 1

越南訪書札記

越南訪書札記

王小盾

越南是中國的親密鄰邦，兩國共有 1150 公里陸地邊界，也擁有相互關聯的政治傳統和文化傳統。越南古王朝甌雒傳說是中國東南部的越族的一支，而在趙佗稱王南越（前 207）至吳權奠都古螺（939）的一千多年裏，北部越南曾作為中國的一個行政區而存在。此後至明代嘉靖年間，越南不斷接受中原王朝所頒封號，其王族亦往往在血緣上與華族相聯繫^①。儘管從 1527 年起，越南進入“自主時代”，但以推行漢文化為實質的科舉制度却持續實行到 1919 年。也就是說，在 20 世紀以前，越南文化一直是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發展的。

同日本和朝鮮半島諸國一樣，越南曾使用漢字作為書寫工具；但較之日、韓等國，它擁有最長久的使用漢字的歷史。從古代越南銘文和西漢南越王墓的出土物^②看，公元以前，漢文篆字即在越南出現。歷史記載亦表明，早在趙佗稱王及漢武帝置南越九郡，設太守、刺史治理之時，詩書教化已伴隨漢文字傳入南國^③。嚴可均《全宋文》卷六三所記釋道高、釋法明《答李文州森難佛不見形》等文，是現存最早的越南文獻，亦是越南作為“文獻之邦”的證明。《全唐文》卷四四六所載著有《白雲照春海賦》、《對直言極諫表》等文的姜公輔，則是產生於越南的最早的進士。科舉制度在唐代施行於越南；至李朝仁宗泰寧四年（1075年）後復興，開科試，“詔選

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④，成為南國獨立行用的制度；此後經後黎朝和阮朝的極盛而衰落於 1919 年。越南歷史上於是有了三千多名進士和不計其數的秀才舉人。這支隊伍承負起以漢語言文學為主流的越南語言文學傳統，也鞏固了漢語言文學在越南文化中的地位。我們於是看到這樣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日本早在公元 759 年《萬葉集》成書以前就製造和使用假名，朝鮮文的創立在 1445 年左右，而越南的拉丁文字則出現於 17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才成為法定文字。這意味着，越南的古代史是以漢字為主要載體的歷史，漢文化在域外滲透最深的地方是越南。若要追尋域外的漢文古籍，那麼，越南顯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地區。

但同以上事實形成明顯反差的是，漢文典籍在越南的遺存情況基本上不為中國當代學術界所知。有鑑於此，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於 1998 年 8 月發起了越南訪書之行。我隨同前往，在河內市西南部的“漢喃研究院”工作二十幾天，系統查看了該院的圖書目錄，檢閱並複印了上百種漢喃古籍。回國以後，我又陸續將所得資料重讀一過，在漢喃研究院陳義、丁文明二位研究員以及朱旭強、何仟年、王福利、李方元、孫曉暉等五位研究生的幫助下，按四部分類法重編了越南古籍目錄。2001 年春天，我再次前往河內，在朱旭強、何仟年、姚蘇平、陶芳芝、阮德全等中越青年的協助下，用兩個多月時間，對所編目錄做了細緻的補充、核實和重新整理，最終完成了《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一書。工作之中，感受頗多，今擬就越南所存漢文古籍的情況，介紹一點認識和體會。其項目如下：

- 一、關於越南古籍的兩類目錄
- 二、經書和儒學
- 三、碑銘和村社史料
- 四、燕行記和北使詩文
- 五、演音、演義、演歌和演字
- 六、小說和詩傳

七、歌籌——陶娘歌

八、各民族的喃文圖書

九、結語：一個類比

一、關於越南古籍的兩類目錄

瞭解某一地區的圖書，最便捷的途徑是瞭解相關的目錄。在越南歷史上按中國文獻學傳統分類編寫的目錄，有二十多種保存至今；而在中國學者馮承鈞編寫《安南書錄》(1932)^①以後，又產生了一批按音序或字符順序編寫的書目。這兩類書目，是認識越南漢文古籍資源情況的嚮導。

第一類目錄屬古典書目，包括《黎朝通史·藝文志》(1759)、《明都史·皇黎四庫書目》、《歷朝憲章類志·文籍誌》(1821)、《黎氏積書記》(1846)、《河內大藏經總目》(1893)、《大南國史館藏書目》(1900)、《史館手冊》(1901)、《聚奎書院總目冊》(1902)、《史館書目》(1907)、《藏書樓簿籍》(1907)、《國朝書目》(1908)、《內閣書目》(1908)、《新書院守冊》(1914)、《內閣守冊》(1914)、《皇阮四庫書目》(1922)、《古學院書籍手冊》(1925)和《南書目錄》(1938)。它們大致反映了越南古籍的歷史面貌和越南古代知識的結構，例如以下二書：

(一)《聚奎書院總目》。聚奎書院是明命時代(1820–1840)所建的書院。其藏書在成泰皇帝時得到整理，1902年，由范允迪等人編出《總目》。《總目》分經、史、子、集四部，共著錄圖書近四千種。其中經部著錄圖書776種，下分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樂、小學等十類；史部著錄圖書712種，下分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抄、載記、時令等十五類；子部著錄圖書1,081種，下分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釋家、道家等十四類；集部著錄圖書1,089種，下分楚辭、別集、

總集、詩文評、詞曲等五類。此書今存三種抄本。

(二)《歷朝憲章類誌·文籍誌》。《歷朝憲章類誌》是產於阮聖祖明命二年(1821)的一部大型政書，由潘輝注編撰。全書49卷，設地輿、人物、官職、禮儀、科目、國用、刑律、兵制、文籍、邦交等目。其中《文籍誌》分憲章(26種)、經史(27種)、詩文(106種)、傳記(54種)四部，共著錄213種圖書。此書今存二十種抄本。

以上兩種目錄，代表了越南古典目錄書的兩種結構類型。其一是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型。這是越南古典目錄的常式，又見於《黎氏積書記》、《東洋文庫安南本目錄》和各個書院的手冊。它表明，從書院或教育的角度看，書籍的功能是傳授源於中國的文化知識。其二是具有越南本土特色的史書目錄。早在《文籍誌》成書六十二年前，黎貴惇所撰《黎朝通史·藝文志》已作憲章、詩文、傳記、方技四分。其特點是取消了經部，並強化了史部的政書。《文籍誌》大序說：“製作之妙，發為文章；心術之存，寓於記載。……典籍之生，其來久矣。蓋自丁黎肇國，抗衡中華，命令詞章，浸又漸著。至於李陳徙治，文物開明，參定有典憲條律之書，御製有詔敕詩歌之體。”由此可見，從史官或政治的角度看，書籍的功能是彰顯民族的文化。下文談到的經、子之書在越南的衰變(多變為科舉教材)，可以通過以上兩種功能觀得到解釋。

上述目錄還反映了史館、書院在保存古籍方面的重大作用。事實上，越南古籍主要就是依靠這兩類機構保存下來的。據記載，越南古代的藏書設施有：建於1021年，用於儲經的八角屋；建於1023年，用於儲藏經律論三藏的大興書庫；建於1036年，用於儲藏《大藏經》的重興書庫；建於1295年，地處今南定天長的佛經書庫。^⑥這些藏書設施主要服務於宗教教育。此後的設施則有見載於《上京風物志》的蓬萊書院，黎朝所建；以羅山夫子阮帖為院長的崇政書院，1791年(屬光中時代)所建；以及見於各種書目的“聚奎書院”、“史館書院”、黎元忠家庭書院、“內閣書院”、“新書院”(成立

於維新時期，即 1907 年至 1916 年)、“古學院”(成立於 1922 年)等。由此可以理解下文談到一個現象：在越南古籍中，最引人注目的部類是聯繫於史館的各種政書，以及聯繫於書院的舉業文獻。

第二類書目出現在 20 世紀 30 年代以後，可以稱作現代書目。其數亦有二十多種，包括日文的《河內遠東博物學院所藏安南本書目誌》(1934)、《東洋文庫安南本目錄》(1939)、《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安南本目錄》(1953)，也包括越南文和其他文字的《北書南印版目錄》、《漢喃書目》(1977)、《越南漢喃遺產目錄》(1993)、《荷蘭萊頓大學所藏的漢喃古籍》(1992)、《英國圖書館所藏的漢喃書籍》(1995)、《日本四大書館所藏的越南本總目錄》(1999)。它們反映了越南漢文古籍的現代遺存情況，也反映了漢文古籍的新的傳播路線。據不完全統計，抄印於越南的漢文和喃文古籍，現在在亞洲、歐洲都有流傳：在法國有一千多種，在日本有二百六十多種，在英國有六十多種，在意大利有三十多種，在荷蘭、泰國則各有三百種以上。^⑦

在這一類目錄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關於越南所藏漢喃文獻的兩部大書：1977 年成書的《漢喃書目》和 1993 年出版的《越南漢喃遺產目錄》(Cataloguedes Livres en Hannom)。《漢喃書目》由越南中央圖書館楊泰明等人主持編寫，1960 年始編，1971 年完成初稿並打印流行，1977 年增補部分書目及索引。全書三冊，共 2493 頁，收錄藏於河內國家圖書館的漢喃古籍 5555 種。《越南漢喃遺產目錄》亦三大冊，以越、法兩種文字印行。它始編於 1984 年，由越南漢喃研究院和法國遠東博物學院合作編寫，擔任主編的是當時的兩院院長陳義教授和佛朗沙·格羅斯(Francois Gros)教授，參加編寫的則有陳文全、黃文樓、楊泰明、枚玉紅、謝重協、張庭槐、陳慶浩等人。以上二書的編寫基礎實際上是河內法國遠東博物學院圖書館的藏書。此館建於 1901 年。據 1951 年的統計資料，當時它有三千五百種越南古籍、兩萬五千件碑文拓片，此外還有玉譜、

神敕、地簿、社誌等共兩千四百種。1958年，遠東博物學院遷回法國，這些資料移交給越南，分別藏在漢喃研究院和河內的越南社會科學圖書館。《漢喃書目》即以此為編纂對象，而《越南漢喃遺產目錄》則同時著錄了一千多種法藏漢喃文古籍。

以上二書代表了越南古籍目錄學的最高水平。據《越南漢喃遺產目錄》統計，1993年前，入藏於漢喃、遠東兩院圖書館並予編號的越南古籍共有5,038種、16,164冊。其中中國書重抄重印本有1,641冊，越南人所著漢文書有10,135冊，喃文書有1,373冊。其餘為雜用漢喃兩種文字的圖書，包括玉譜（神的事跡）535冊、神敕（封神的敕文）404冊、俗例（鄉約）732冊、地簿503冊、古紙96冊、社誌16冊。這是關於現存越南漢文古籍的最新統計數字。

但以上數字是有很大缺漏的，因為它沒有計入未編號的那些古籍。在漢喃研究院圖書館，這類未編號的古籍，僅1987年以前入池的即有729種。漢喃院圖書館的目錄箱中還有一種“複印本目錄”，既著錄本館的複本書，也著錄本館無原件、影自其他圖書館的古籍；除去重複，其未編號者亦有兩百多種。因此之故，《越南漢喃遺產目錄》的續編工作並未中斷。此外一種情況是，越南古籍的裝幀方式頗不同於中國古籍：絕大部分是手抄本，往往把數種內容未必相關的圖書抄於一冊，合用一名。因此，按形式計，《越南漢喃遺產目錄》著錄圖書5,038種；按內容計，亦即按劉向、劉歆整理圖書之後的中國圖書單元概念計，其數則接近《目錄》所統計的冊數，在一萬以上。這個數字，尚不包括兩萬五千件已入藏的碑文拓片。總之，越南漢文古籍的資源，是遠遠超過各種統計數字的。

二、經書和儒學

同大部分現代書目一樣，《越南漢喃遺產目錄》是按書名首字音序編排的，書中內容的比重未能反映出來。其書主編陳義遂

依現代觀念，對所著錄的 5,038 種圖書作了一個分類統計。各類種數依次為：文學 2,500，史學 1,000，宗教 600，教育 450，社會政治 350，醫藥衛生 300，地理 300，法制 250，藝術 80，經濟 70，語言文字 60，數學物理 50，其他（軍事、建築、農業、綜合等等）40。這顯然是一個粗略的統計和分類，但它說明，文學在越南古籍中佔有半壁江山，而傳統的經學或儒學却失去了作為學術重心的位置。

為了便於對中越兩國的古籍進行比較研究，我們在編輯《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之時，也對該書所錄 5027 種圖書作了一個分類統計，其數據如下：

（估） 經部 147 種(2.9%)：易 32, 書 7, 詩 13, 禮 11, 春秋 11, 五經總義 13, 四書 27, 孝經 8, 小學 25;

（估） 史部 1667 種(33.2%)：正史 14, 編年 16, 雜史 100, 北史 11, 燕行記 8, 政書 578(含通制、儀制、職官、科舉、邦計、邦交、軍政考工、刑法、詔令奏議、公牘、鄉約、田丁簿、交詞等目), 傳記 519(含總傳、別傳、神跡、譜牒、日記等目), 地理 272(含總誌、方誌、地圖、風土、名勝、外國等目), 目錄 16, 史鈔 11, 金石 30, 雜說 77, 少數民族文獻 15;

（估） 子部 1529 種(30.4%)：儒學 68, 雜學 26, 類書 19, 蒙學 50, 家訓 23, 兵家 20, 醫家 332(含總論、內科、五官外科、婦兒、痘疹、經脈針

灸、藥草方劑、雜錄等目),曆算 43(含天文曆法、算書等目),數術 188(含堪輿、星命、易卦、相法雜占、籤讖等目),藝術 26(含書畫、音樂、日用等目),佛教 314|(含經、律、註疏、論述等目),基督教 27,道教與俗信 393(含道教、降筆文、神敕、其他等目);

集部 1684 種(33.5%):

總集 212,別集 455,詩文評 10,北使詩文 80,酬應文 63,應用文體 119,舉業文 314,賦 54,六八體詩歌 34,歌謡 35(含歌曲、謠諺二目),陶娘歌 29,戲曲 33,小說 140(含詩傳、章回小說、傳奇、筆記等目),金雲翹 18(含漢文傳、喃文傳、詩賦、其他等目),雜抄 88。

這些數據,可以同有關清《四庫全書》的一些數據相比較。在《四庫全書總目》所著錄的全部圖書(包括附錄書和存目書)中,經部書佔 17.7%,共 1,881 部;史部書佔 20.7%,共 2,206 部;子部書佔 28.8%,共 3,070 部;集部書佔 32.8%,共 3,497 部。若以經部古籍為比較的基點,那麼,無論從數量上看還是從比重上看,越南的經學都是很貧弱的。同清四庫中的經學典籍的數量相比,祇相當於它的十三分之一;同其比重相比,祇相當於它的六分之一;同越南古籍的其他部類比,祇相當於史、子、集等每一部的十分之一,而不及史部中的政書、傳記、地理等小類,不及子部中的佛教、俗信、醫家、數術等小類,也不及集部中的總集、別集、舉業文等小類。這反映了中越兩國古籍結構——至少是不同觀念中的古籍結構——的一個重要差別。

我們還對列入經部的 147 種越南古籍作過分析,得出以下一

表：

| | 易 | 書 | 詩 | 禮 | 春秋 | 五經 | 四書 | 孝經 | 小學 | 總計 |
|----|-------|-----|-------|-------|-----|-----|-----|-------|-----|-------|
| 使用 | 28種 | 6種 | 8種 | 9種 | 9種 | 6種 | 14種 | 1種 | 11種 | 92種 |
| 抄本 | 87.5% | 86% | 61.5% | 82% | 82% | 46% | 52% | 12.5% | 44% | 63% |
| 使用 | 6種 | 1種 | 7種 | 2種 | 1種 | 2種 | 4種 | 3種 | 13種 | 37種 |
| 喃文 | 19% | 14% | 54% | 18% | 9% | 15% | 15% | 37.5% | 52% | 25.5% |
| 舉業 | 6種 | 4種 | 2種 | 5種 | 4種 | 5種 | 10種 | | | 36種 |
| 用書 | 19% | 57% | 15% | 45.5% | 36% | 38% | 37% | | | 25% |

也就是說，越南經學古籍的分類結構是：易 32 種、書 7 種、詩 13 種、禮 11 種、春秋 11 種、五經總義 13 種、四書 27 種、孝經 8 種、小學 25 種。易和四書所佔比例最大，而書和孝經所佔比例最小。從形式上看，則有抄本多、喃文書多、舉業用書多的特點。且讓我們具體看看以下幾部古籍：

(一)《周易國音歌》：鄧泰滂編撰，李子瑨校訂。有阮浩軒 1750 年序、武欽鄰 1757 年序、范貴適 1815 年序。印本 438 頁，有 9 幅圖。體裁為六八體喃詩。

(二)《詩經演音》：作者失名。抄本 394 頁。內容為用六八體和七七六八體詩對《詩經》的仿譯。

(三)《孝經國音演歌》：棉喬撰，范有儀序，印本 40 頁。內容是對《孝經》的六八體喃譯。亦屬多書雜抄，附有《活世生幾孝子光傳》(採自中國邵紀堂作品)和喃文《補正二十四孝傳演義歌》。

(四)《四書策略》：作者失名。今存抄本五種，分別為 412 頁本、268 頁本、168 頁本、160 頁本和 100 頁本。內容為科舉策文文選，題材採自四書。

以上諸書，明顯具有不同於中國經學古籍的特質。《周易國音歌》有圖，用六八體，乃是通俗化的《周易》，而非學術的《周易》。類似的通俗化傾向也見於六八體的《詩經演音》。至於《孝經國音演歌》，則可能用於日常說唱，故同《活世生幾孝子光傳》、《補正二十

四孝傳演義歌》等韻文敘事作品雜抄在一起。這些書籍且有較大的流傳規模。例如《周易國音歌》有寫於 1750 年、1757 年、1815 年的三篇序，曾經多次重刻重印；而《四書策略》則有五種抄本存世——表明科舉造成了對經學書籍的廣泛需要。

以上諸書的通俗性、應用性特點，乃表明了越南經學書籍同文化教育的關聯。且不說舉業用書明顯產生於科舉教育的需要，即就喃文書的通俗化色彩看，它也應當是具有教科書性質的圖書，主要用於各類學校的啓蒙教育。而多以手抄本形式流傳的情況，也是與上述用途相對應的。越南經學古籍中有 36 種舉業用書，其中絕大部分（33 種）製為抄本，即反映了手抄方式同舉業的聯繫。而抄本中“書”的比重最大，“孝經”的比重最小；喃文書中“詩”的比重最大，“書”和“春秋”的比重最小；舉業書中“禮”和“五經正義”的比重最大，“詩”的比重最小：則反映了三種體裁形式同三種功能的對應——“詩”是最重要的語言文學教科書，故多採用喃文“演音”的方式作為原本的對照；“書”和“春秋”是舉業的必修功課，故多用漢文，多以“演義”（黎貴惇撰有《書經演義》）、“節要”（裴輝碧撰有《書經節要》）、“精義”（失名撰有《書經精義》）、“略問”（又有收錄 59 篇策文的《書略問》）的方式用為撰寫策文的參考；“孝經”則是用於教化的儒家經典，故多以印本的形式流傳，多採用“釋義”（如《孝經釋義》）、“譯義”（陳文燦以喃文撰《孝經譯義》）、“立本”（棉嶽撰《孝經立本》）等闡發內容的方式。結合前文關於越南經學古籍結構變動的看法，可以認為，其功能主要就是教化（以“孝經”為代表）、語文教育（以“詩經”為代表）、服務於科舉這三種功能。

經學古籍傳入越南之後，在非常廣大的範圍內發生了影響。但它主要不是向學術方向發展，而是向應用方向發展。隨之產生出來的，不是以訓解、闡發、研究儒家經典為主幹的經學，而是以宣講仁愛、綱常等倫理觀念為主要內容的儒學。在現存的越南古籍中，有《勸孝歌》、《日省吟》、《勤儉彙編》、《孝順約語》、《女則演音》、

《婦女寶箴》、《訓俗遺規》、《福田言行錄》、《修身倫理科》、《聖教三字經》、《返性圖書國音》、《二十四悌新錄》等近七十種儒學書，又有《裴家訓孩》、《傳家至寶》、《窮達家訓》、《家範輯要》、《明道家訓》、《阮氏家訓》、《教訓演歌》、《居家勸戒則》、《楊公訓子歌》、《黎貴惇家禮》、《吳公訓子文》、《阮唐臣傳家規範》等二十多種家訓書，此外還有大批鄉約（約 111 種）和譜牒（約 264 種）。這些書籍反映了《孝經》、《四書》所代表的教化功能的輻射，同時也反映了越南經學與倫理教育合流的事實。

三、碑銘和村社史料

在越南古籍中，和中國史部金石類相對應的典籍，主要是一些碑銘文獻。若將其分類，則有六種：一為城碑，如《河內城碑記》；二為佛跡碑，如《廚所佛祖遺跡碑》；三為祠堂碑，如《尚書宰相公祠堂碑記》；四為摩崖碑，如《摩崖紀公文》；五為社神碑，如《扶琴社后神碑記》、《獨步社神祠碑記並扁抄錄》；六為寺廟碑，如《隊山寺碑》、《北寧寺廟碑文》。其中數量最多的是寺廟碑和社神碑。越南潮濕，紙書不易保存，所以碑文可以填補早期紀年史料的空白。例如較早的碑文書有《隋時大業碑文》，記錄公元 618 年愛州（今清化省）官員的學才和家世；稍晚則有阮公弼撰於 1121 年的《隊山寺碑》、阮忠彥撰於 1335 年的《摩崖紀公文》。後者刻在密州摩崖之上，記載陳明宗討伐哀牢的功業。

但越南碑銘的絕大部分，却還沒有整理成書，而以拓片形式保存。在漢喃研究院，即藏有兩萬兩千版碑文拓片，由一個專門的小組在整理。《北寧省歷史文化中的碑文遺產》一書作者范垂榮告訴我，她所研究過的京北地區的碑拓有 1,063 版，涉及 17 個縣 328 個村社。我看過這些碑銘拓片，它們和已經成書的碑銘文獻不同，內容更接近下層社會，是研究越南古代村社的重要史料。

實際上，這樣兩種碑銘的區別，正好對應於中越兩國碑銘的區